

话 题
之 一

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的失误，
而是历史的必然

一、历史的结论：选择社会主义是 顺乎时代潮流的必然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150多年前，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徘徊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东方古国——中华大清帝国，正在罹受着一场本民族亘古未遇的历史性灾难，一座古老的帝国大厦仿佛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倾泄在神州大地的洋货、洋烟、洋炮弹，震醒了每一个封建臣民的帝国梦想。对此，马克思曾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写道：“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自然要解体一样。”

历史的耻辱，让人激愤，也让人无奈。历史的悲怆，更让人震醒，催人奋起！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无数的志士仁人，他们以西方列强的强盛为参照，探寻了种种的“救国理论”，设计了一个个“强国方案”。在他们心目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是造成中国历史灾难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引导”中国社会由贫弱落后走向西式“文明富强”的模式取向。因此，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救亡图存方略，基本上成为中国近代整个

知识分子群体最基本的价值认同 据此 也演化出了一幅幅近代资本主义的或带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救国蓝图”但其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的确发人深思。

首先 是中国近代开明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对“君民共主”和“工商立国”理想目标的追求。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 曾以“医国手”而自矜的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鼻祖龚自珍，针对当时清王朝的社会凋敝，率先提出了一套以“改制”、“更法”为手段 以否定君权神授、实行君民共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改革方案。显然 这一“君民共主”的改革主张，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叛逆精神，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具有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方案。但是，在晚清腐朽黑暗的专制主义统治下，这一方案根本不可能获得实施。不久 龚自珍的好友林则徐 又在这种“更法”、“改制”主张的基础上 提出了“探夷况”、“筹夷情”学习西方 广开眼界的思想 他第一次把“改制”与“师夷”相联系 使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革主张进一步深化。

在早期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中，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和进行社会改革等问题的认识更为全面、系统和更具理性化的还属魏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血腥残酷的现实，使魏源痛心疾首。悲愤之中 他用饱蘸血和泪的笔墨，一气写下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和《海国图志》等不朽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不仅从军事的角度，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一些朴素的游击战、持久战思想 而且还从“救国”、“自强”方略的角度 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提出的学习西方除了“器物”层次的“长技”外 还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比较系统、比较详尽地介绍和评价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比较中肯地分析了英国、

意大利、法国等各国政体的异同等。魏源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幕僚，其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评介，虽然不会对晚清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作为晚清“补天派”改革人物的杰出代表，其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朦胧向往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却犹如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密封罐上戳开了一个小孔。从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观念的新鲜空气开始自然地流入古老封闭的华夏大地。因此，魏源也被称为向西方“盗取”民主政治思想的第一位“普罗米修斯”。

尽管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都是晚清开明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试图以不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前提，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一些新式企业，透进一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的设想，只能成为他们表达美好愿望的一种幻想。历史证明，开明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把中国社会引向一条具有较强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发展道路。

但是，还有一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晚清朝臣，并不甘心这种失败，他们仍然试图通过以“中体西用”、“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来达到“工商立国”的目的。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是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曾国藩作为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功”先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晚清“中兴之臣”的称誉。他在带领湘军“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资夷力以助剿”决非久安之计，而最根本的办法则是“师夷智以造船炮”。从魏源的“师夷技”到曾国藩的“师夷智”，不能不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进步。正是在这种“师夷智”思路的引导下，1861年秋，曾国藩

率先创办了第一个洋务企业安庆军械所。此外，他还广泛罗致了一大批通晓西学的科技人员，协助操办洋务。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还保荐了一大批以创办洋务而著名的显赫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郭嵩焘等。其中李鸿章的成绩尤为突出。他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电气局等新式近代军事工业，并参与和主持筹编北洋、南洋、福建三洋水师。李鸿章还是第一个创办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始人。

为了培养更多的从事洋务事业的人，中央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奕折等还创办了一批传授“西艺”、“西文”知识的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等。它们对洋务运动的展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又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商立国”观点，为洋务运动的全面铺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都以“通商”为名，而行侵略之实。因此，中国反对列强的最好措施是“以商敌商”、“以商制商”。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盛宣怀等更是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商务为体，兵战为用”、“以商立国”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能开关互市、讲求商政，招募殷商富户认办各种工商实业，形成一种从内地一边省一外洋的工商格局。如此几十年之后，则必然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从而达到“商战而从容坐镇屈人者也”。1872年，李鸿章首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陆续出现了基隆煤矿、开平煤矿、天津铁路公司、汉阳铁厂等一大批民用企业。在封建官僚“洋务”的刺激下，中国也诞生了一批用民族资本举办的机器工业。自1860年至1890年的近30年间，洋务派创办的各种军事工业企业达19个，民用工矿企业29个，修建铁路364公里，购买轮船20余艘，

具备现代运输能力 5 万余吨。民族资本也举资 1 700 万银两 所办企业也多达 136 个。

“中体西用”、“工商立国”口号下的洋务运动 的确使中国诞生了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培养和训练了一批掌握近代生产技术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先进技术和政治学说的书籍，培养了一批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的留学生。然而，以巩固封建统治为最终目的的洋务“自强”运动，并没有带来国运的昌盛 以“工商立国”为口号的“求富”、“自新”也并没有把中国落后的传统社会带进资本主义“工业王国”的神圣殿堂而实现人们的富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资本主义先进的近代工业，一旦艰难地生长在中国千年封建主义和列强殖民主义的夹缝里，就注定它的命运只能一步一步地被封建化、买办化，最后蜕变为阻碍中国社会革命和进步的历史反动因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前身。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创办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它也宣告了洋务派以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为摹版的洋务救国运动彻底破产。

从上可知 无论是“君民共主”还是“工商立国”从根本上看 它们都属于“以夷为师”和“中体西用”社会改良模式的基本范畴，它们尽管也探讨了一些带有强烈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发展措施 但是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因此，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革为前提的，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关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常发展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残酷地蹂躏和摧残了正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使那种试图以资本主义的“器物”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带有强烈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发展模式，来挽救晚清危亡政治局面的任何企图，最终都一一地走向了破灭。

其次，中国农民阶级的领袖也不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那种力图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力基础上，学习和照搬资本主义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显然也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早在 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就颁布了一个字数只有 3 000 内容却涵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许多方面的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主张建立一个不允许有任何剥削的公有社会，从行动上看，它表现出的不给封建地主阶级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奋斗精神，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同小私有者农民的私有观念决裂的决心。《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把古代社会思想的营养与历代农民阶级的经济“平均”和原始朴素的“平等”相结合另一方面，它又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某些内容，把基督教的“人人皆兄弟”的“博爱”观等宗教理论与中国农民斗争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把中国农民运动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但是，1856 年的天京变乱，使天京局势变得十分困难。此时，避居香港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玕于 1859 年来到天京。在他的辅政下，太平天国又公布了一个力在挽救天国危亡局势的革命纲领《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地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献。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在政治上，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直接灌输于太平天国的君主制度之中。针

对太平天国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弊病，洪仁玕提出了加强监督、强化法制和选贤任能、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例如选举“邦长”、总目（各级官吏）、设立“暗柜”（意见箱）、创办报纸、创设新闻官等。这样就可以达到“天下永垂不朽”的美好理想。（二）经济上，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近代经济体系。如兴办近代交通运输、提倡机器生产、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开办银行、鼓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等。（三）在文化方面，反对宿命论，主张改造社会习俗，设立医院、学馆、礼拜堂、育婴院，以“德”辅法，以“刑”省德，加强道德教育、加强法制教育，建立和美的“士民公会”。《资政新篇》的确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治国方案。它在反对封建和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描绘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资本主义图景。它也使得自古代以来小生产者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天国”上空，一时闪烁着一个十分美丽、耀眼的资本主义“光环”。

然而，无论是反封建、反剥削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施政纲领的两个姊妹篇，虽然采取了一些废除地主土地私有的主张和措施，从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后者更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设计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企图在小农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建立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天国，但是显然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

由于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的相继失败，历史也把中国资产

阶级的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使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解决摆在自己面前的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无法调动工农群众的千军万马，再加上他们缺少先进的思想武器去抵御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他们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亲历香港，深为香港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法度所折服，从此踏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难历程。中法战争失败后，康有为痛心疾首，他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通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这是康有为首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首次向清政府提出变法的建议。但是，这份上书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音讯。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在极度悲愤之中吟出了“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的绝唱。

1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再次赴京应试，适逢甲午战争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结局，使应试的举人们感到了莫大的耻辱。5月12日，康、梁发动18省举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史称“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此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建立一个与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政权。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在维新改良派的鼓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有：（一）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减冗员，精简机构；（二）提倡实业，设立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及各省商务局，以推动商业发展；（三）整

顿军队 裁减绿营 精练陆军 添设海军(四)废除八股制度 改试策论 取消各地书院 改设新式学堂等。

维新派的上述改革措施，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 但是在政治上它开放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 组织上几个维新人物进入了政权机构 参与新政 在思想上是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改革一开始也受到了极大的阻力。9月 那拉氏发动政变 光绪皇帝被囚禁 维新人物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害 维新运动的根本性政治主张如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来不及展开就夭折了。其他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外 全部废止 时仅 103 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维新变法的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幻想通过对封建主义温和改良的方法 建立一个“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是根本行不通的 它只能引导着改良派走上一条没有归途的渺茫之路。

正当维新派尚在构筑他们的君主立宪梦想时，曾目睹过太平天国的悲壮，亲历过改良道路苍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1894 年 11 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决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晚清帝制，“创立合众政府”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895 年，领导广州起义 失败后流亡海外。此时 孙中山系统地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美国亨利·乔治的单税制对他的影响尤大。1903 年，当他再次回到檀香山时，重建了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军”并在原兴中会誓词基础上提出了“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口号 这样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已初具雏形。

1905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1 月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对同盟会的纲领

作了进一步阐述 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此后，革命党人又以此为武器，同改良派进行了一系列的论战，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实践这一方案，孙中山还领导或参与了广州、广西和云南的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但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之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软弱和妥协性。孙中山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反而认为民族、民权革命已经完成，惟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于是孙中山又走上了一条探寻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的实业救国之路。同时孙中山也在其《建国方略》中，把他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推至最为完善的理想境界。这就是：

在民族主义方面，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解释为民族的自主、独立。认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对外争取独立，对内实现民族的自由、平等，实现汉、蒙、满、回、藏五族一家，“中国人民一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

在民权方面 采用民主立宪政体 经过“三法”分治的民主程序进而达到“五权”分治的民主政体的目的。“三法”分治 即中国革命应依次经过以“军法”为依据的“军法之治”（又叫军政时期）依据“约法”的“约法之治”（又叫训政时期）依据宪法的“宪法之治”（又叫宪政时期）三个阶段。“五权”分立 即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 再加上“监察权”、“考试权”。与此相应 在国家机构中除了总统、议会外 另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彼此独立，既可避免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畸重弊端 又可防止作弊 防止任人惟亲。

在民生方面，用平均地权的方法，既发展资本主义，又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对立。平均地权的具体方法是：先由国家统一核定地价，以现有地价归原土地所有者拥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所增地价归国家所有，为全体国民共享。因此，孙中山曾乐观地指出，“若能将平均地价作到，则社会革命已成功七分”这样私人将永不再纳税 仅地租一项 中国就变成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不仅能在政治上成为民主国家，经济上也会成为社会的国家。孙中山曾在很多场合直言：“民生主义，即时下的社会主义。”

尽管孙中山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设想是十分美妙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弱点，孙中山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可能获得彻底实施的条件。1913年7月，袁世凯调动军队三路南下，迅速将“二次革命”扑灭 孙中山、黄兴逃亡国外 他们竟在自己缔造的“中华民国”里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亚洲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没有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

最后，那些关注中国前途、关注民族命运的各色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能实现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 从 20世纪 20年代初期的“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的垮台到三四十年代的“平民革命”和“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深刻地表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了，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只能是一条毫无生路的死胡同，惟一可行的路只能是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之梦，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梦中越陷越深。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迅速分化，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

了一幕幕“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军阀纷争闹剧。1920年7月湖南军阀谭延闿率先打出“湘人治湘”的旗号，揭开了联省自治的序幕。接着1921年1月四川军阀刘湘宣布四川独立。此后，张作霖在东北、卢永祥在江浙、陈炯明在广东纷纷打起自治旗号。一时间，广西、湖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相继响应，各省先后召开省宪会议，制定、公布省宪法，联省自治达到了高潮。在联省自治运动中，胡适、章太炎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这一思潮的主要鼓动者。1922年9月胡适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提出建设在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国家。章太炎也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一文，提出了“制宪救国”的主张。

“联省自治”从其思想渊源上看，直接始于美国的联邦制。联省自治方案的具体操作是：首先实行各省自治，由省自定宪法，并由省宪法组织省政府；其次由各省选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最后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资产阶级共和国。联省自治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也同样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从1922年起，吴佩孚便利用硬打软拉的办法，分化瓦解了各地方实力。湖南军阀赵恒惕又摇身一变，率先表示接受黎元洪的控制，放弃了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喧嚣一时的“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联邦制共和国方案正式破产。

“好政府”主义是胡适、蔡元培等一批大学教授在“联省自治”方案开始破产的条件下，提出的又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方案。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在《努力》周刊上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方案。他们认为，“好政府”必须具备如下标准：一是有正当的机构可以防止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二是能充分利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

求充分的福利 三是‘好政府’必须是具备‘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三项原则 以及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等六项具体措施。9月 在吴佩孚的支持下 组成了以王宠惠为署理内阁 罗文干、汤尔和、顾维钧分任财政总长、教育总长、外交总长的‘好政府’。但是，由于军阀的严重牵制，11月，当了三个月军阀奴仆的“好人内阁”被迫解散 胡适等人所崇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案又一次以彻底的破产而告终。

接着 就是‘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后期 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 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的专制独裁政权。这时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从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人物 如邓演达、谭平山等 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群体为基础 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历史上称之为“第三党”。1930年8月 邓演达等起草并发表了‘第三党’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提出了“平民革命”的口号。他们认为 蒋介石南京政权是一个比任何时期官僚军阀更为腐败的反动政权 根本不能代表平民利益 因此必须推翻。同时，“第三党”也不赞成共产党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他们主张通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 仿照欧美的议会制形式 建立一个反映社会最广泛阶层利益的平民政权。平民政权的主要政策是：对外实行关税自主 对内以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 提倡农业合作社 改善工人生活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

1931年8月，“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在一次策划军事反蒋的干部培训活动中，不慎被捕。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从此，“第三党”的组织和活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33年 在全国反

蒋抗日的高潮声中，“第三党”又与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以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为代表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贯彻和实施了“第三党”的部分政治主张。但是由于“福建人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失误和蒋介石的强力镇压而最终失败，“第三党”的“平民革命”主张彻底破产。

在国共分野后，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为代表的反映地主阶级利益，主张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乡村建设复兴民族”的社会改良方案。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弱落后源于文化的失调。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因此改造中国既不能仿效西方，引进“个人本位、阶级竞争”，也不能照搬俄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独裁”。解决中国出路的最好办法是积极推行乡村建设，即以县政、村政、自治自卫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建设，以合作社、农业改良为核心的乡村经济建设，以教育、卫生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建设。为此，他们先后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山东邹平等地开展乡村建设试点。1935年，由于日军的进一步入侵，民族矛盾加剧，国内形势也随之发生变化，乡村建设运动犹如昙花一现，迅速瓦解。

抗日战争期间，经张澜、章伯钧、曾琦、梁漱溟、张君勱等人联合发起，由第三党、青年党、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于1941年组建民主政团同盟。他们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一党专制，提出既反对蒋介石但又不同于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的建国主张。他们认为，未来的国家必须以西方国家的代议制、三权分立为基础，结合英美的内阁制和总统制特点，建立联邦制形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抗战胜利后，民主同盟在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把这一方案同他们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主张作为政

治纲领提出来，企图以此来限制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实现自己参与国家政权的目的。但是，这种以空洞的资产阶级民主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只能是民主同盟的一厢情愿。不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会放弃其专制统治，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不可能放弃为之浴血奋斗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道路。因此，到 1947 年 10 月，当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和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时，也就标志着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彻底破产。

从此，各民主党派终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梦幻中走了出来，接受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实现他们最伟大的转变，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以上分析表明：由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自近代以来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大政治力量，都曾试图把中国引向一条资本主义或带有强烈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压和中国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空间和条件，一切企图以最终发展资本主义、或带有强烈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改革、改良方案，都最后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也一次次地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郑重的选择

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反复的实验后，历史演进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人民在苦苦的寻觅中，终于找到了